

从剥削和所有制形式看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对趋同论的批判

〔日〕松永裕方* 林茂森译

“趋同论”和经济改革的方向

苏联《海外评论》1990年7月一期刊载了题为“‘现实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文章,作者是Y·希希柯夫。这篇文章代表了苏联学者最近的一种论调——主张趋同论。下面就其要点作一介绍。

“现实社会主义”还未达到社会主义,是处于“过渡期”的“分娩前阵痛的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无疑对国家加速工业化、提高防卫能力和有效地发挥财政及其他物质资源的作用产生影响”,但其结果却是“生产资料”并未“真正成为社会的”,并未具有“经济意义上的全民所有性质”。因此,“城乡劳动者把国有视为与己无关的经济力量”,它对“已有的生产力来说是‘过于庞大化’的东西”。“现实的生产关系”表明了“家庭的、小集体的、合作社的所有制”的“经济上的长处”。

“经常的短缺状态”产生“贪污、投机和侵吞公有财物的人”以及“地下犯罪组织”。农民的收入为城市所吸取,致使“城乡劳动者的阶级差别十分明显”。因而“维持了各种隐蔽性的人剥削人形式”、“产生阶级的经济条件依然存在”。

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主义”距离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标准相差还很远。“还必须朝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其将来如何,取决于对所有制关系作何种根本性改革,能否创立有效的经济机制,……能否提高劳动者的关心”。

而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愈益强大”。“具有越来越发展的生产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在决定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在经济的意义上)占有的真正性质方面,其普遍化的实际水平远远超过我们。这表现在,今天在西方,对工业、运输、服务部门的主要固定资产的绝大部分都是股份所有制在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最适合于生产社会化不同水平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其管理、利用的结合”。

这样,“就现实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正朝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料的,被称作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方向前进。西方统治阶级并不希望这样,他

* 作者是日本社会主义协会学习部长。标题的副题是译者所加。

他们是反对社会变革的。但实际生活迫使他们走上了这条道路”。所以，“今天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已不能在资本主义传统的框架内构筑，因而已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

“必须进行总结。由于种种原因，两种实际存在的社会经济体制，可以勉强地称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前者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还不是社会主义，后者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已不是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主义虽有程度上的不同，都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西方各国也都“处在这个过渡期的各个阶段上，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向着社会主义航行”。两者哪一方“先达到社会主义，时间将会给以证明”。

希希柯夫强调“所有制关系的根本转变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将来”。这是因为西方各国持有适应生产社会化不同阶段的所有制和管理形式，“保健、退休金保障及其他几个领域比‘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远为先进”。这种主张是“趋同论”之一，两者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更接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这个观点来看，似乎东欧的崩溃也许是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前进了！？

希希柯夫的文章强调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要性，竭力主张向包括积极承认私有制的所有制的彻底改革前进。其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是以土地、生产资料国有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向承认实质上的私有制方向转变。要把约60%的国家资产改为其他所有制形式，包括向国有企业的股份公司化，同外国法人、外资企业、家庭和个人企业的过渡等。个人企业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也得到承认。

但是，保证股息不是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不会成为不劳而获的保障一个也没有。如果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和雇佣劳动，那就不能避免产生剥削。这决不是所有制法提出“防止人剥削人”就可以避免的。正如水的温度超过100度就要变为汽体，禁止是无用的一样，因为这不是法律问题。列宁曾指出，“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部门的所有权合法化，还是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命令的权利合法化，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权利的极大歪曲，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弃”^①。

越是以“趋同论”观点来论述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就越难免使人产生与资本主义复辟相联系的担心和畏惧。不妨说，它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资本主义变了吗？

第2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了。从那时开始，保卫资本主义的“新理论”也就喧嚣起来。什么“人民资本主义论”，“混合经济论”，“福利国家论”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说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小撮资本家所统治的制度了，好象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份分散化中所看到的，它已成为人民大众的制度，阶级对立已成过去。说什么经济已成为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社会保障制度业已确立，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中文版第34卷第448页。

国民的安定生活已有保障，等等。

但经过1974年、1975年的危机和资本主义从未有过的危机深化时期之后，上述喧嚣销声匿迹了。代之而出现的，认为竞争才是活力源泉，依赖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思想是产生停滞的根源的说法，又开始宣传废除福利制，提倡国民“自立自助”精神，强调劳动者除努力自助外，别无其他提高生活水平的途径。

从那时起，宣传资本主义改良的无限可能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又被强调起来。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也有人提出了“趋同论”，甚之连重新返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调也随之出现。这些都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停滞而产生的理论上的混乱。

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怎样加以美化，也改变不了它是资本剥削和掠夺工人、劳动人民这种体制的本质。下列事实足以说明，资本家为了加速发展生产力和确保垄断利润而不断进行的“合理化”，给人们带来的乃是：劳动条件的恶化、劳动强度的增大、劳动灾难、健康的损害以及失业队伍的扩大。国家各种干预经济的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和税收加重。甚至当初为了回避工人的阶级反抗，对之进行拉拢，作为一定让步而被迫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到现在已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重大负担，看成是激发经济“活力”的障碍，已在实际上强行废除了。现在，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加剧，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不稳定性正在增长。

关于资本主义的实际状况，本刊以及其他一些刊物，已做了反复的揭露，不必在这里再加赘述。只有一点必须重新予以确认，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不仅不能克服，而且已经发展到顶点的，除实现社会主义外再无其他办法可以克服的阶段的资本主义。

社会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贫困化”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调和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就必须有在其统治下劳动的工人的存在。资本主义就是在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这种分裂情况愈益发展中完成起来的。这样一来，就使“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①。

可是，任何社会，要生存下去，就要有必需的社会总劳动。社会总劳动必须适应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欲望而分配于各个部门。在商品生产社会，它是通过产品交换进行的。

资本主义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更确切地说是商品生产扩展到社会一切角落，使劳动力也成为商品的社会。因而支配资本主义的规律是商品生产的规律。其本质乃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429页。

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①

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成为统治形式，商品生产的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加剧。资本主义使每个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具有日益加强的组织性，它使竞赛愈来愈激化，发展成全国性的乃至全世界性的斗争。

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更多的劳动人民变成无产阶级，同时“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大工业中不断改进机器”。即迫使他们进行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的“合理化”。

就这样，劳动生产能力越高，资本的统治能力就越强，而工人的生存条件就越来越不稳定。

正如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阐明的，“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型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②

在社会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迅速扩大带来的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爆发，它招致失业者增加等工人状态的极端恶化。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深化也就成为必然。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不能不增加被训练的和团结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

所谓“贫困化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它揭示工人状态的恶化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并依此来阐明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到来的必然性。

剥削的强化和现代资本主义

现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与以前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但生产力的资本性质并无差别，资本的统治力量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却愈来愈增强了。

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手段的大规模化同时，资本愈加集中，产生了股份公司。把零碎资金集中起来转化为资本，有可能使用更巨大的生产资料。然而它并不使资本成为人民大众的东西，反而提高了资本家的统治力量，加强了剥削工人的力量。于是资本集中进一步发展，从竞争中产生垄断资本。然而垄断也决不能排除竞争。“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激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③

在资产阶级国家条件下所进行的国有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其本质是维持和强化其统治。但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不只表现在股份公司化、垄断的成立和产业国有化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429页。

^② 《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707页。

^③ 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07—808页。

面。今天的国家为了强化垄断资本，还积极进行整顿完善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政策、国民经济的有效改组等。这种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维持资本主义体制的资本主义，称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正如在日本的国有铁路的“肢解、民营化”中所看到的，今天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压制工人阶级的运动，已发展到直接伪装倒闭以大量解雇工人，恣意破坏工人权利的地步。并且在废除福利措施的基础上，引进对企业和富人减税，增加群众赋税负担的消费税制度，实行更露骨地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政策。股份公司化、国有化愈加成为强化少数垄断资本家阶级进行统治和剥削的手段。以限制、诱导为根本手段的国家经济政策，虽然引进了计划性，但占有的私人的和资本主义形式并未废除，社会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根本未克服，因而既不可能消除经济不景气和危机，也消除不了失业。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不过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进展，企图使之维持在资本主义关系限度内的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而已。

现实社会主义问题的症结

在议论现实社会主义各种问题时我们决不能忘记经常回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出发点上来考虑问题。

正如迄今所反复论述的，所谓社会主义，即是把主要生产资料改为全民所有制，从而消灭剥削，建立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但现在苏联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引进市场经济，看来对所有制的改革，似乎正朝向与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方向，是在回到新经济政策这一口号下进行的。

但所谓新经济政策是在当时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的政策。当时的情况是，虽然内战取得了胜利，但国内却是农民占压倒优势，工业很不发达，加上西欧革命的失败，不能指望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援助。这个政策在工业上是以迅速发展大工业为目标而引进“外资”（实际上远较预定计划为少）；在农业上引进粮食税而转向商品自由化。虽然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资本主义，但不足为患，正如列宁所强调的那样，是因为控制了工业的制高点，存在着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可是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东欧，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权都转到反社会主义势力之手，在苏联，工人阶级的领导能力也显著下降。这是决定性的差异。而且，在全社会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想要不经历大的新的混乱而返回新经济政策，已是不可能的事。

社会主义的真正复兴，只有强化全民所有制的主导作用，确立非官僚主义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才有可能。其他的方法，尤其是引进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等资本主义的方法，只能给社会主义带来新的困难和混乱。这一点只要看一下目前改革所导致的现实，就很清楚了。

莫斯科大学耶·柯索拉波夫教授说：“数量近 $1/4$ 的社会产品，不是通过按劳分

1991年2月—5月 波兰政局发展纪要(七)

陈幼度

2月18日 波兰总统瓦文萨的顾问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就当前最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的超额奖金税进行了讨论。会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意见:一是主张取消超额奖金税,认为采取超额奖金税会把工资冲突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是一种无效手段,应取消。瓦文萨支持这一种意见;另一是主张维持这一税制。持这一种意见的一派认为不征收超额奖金税会导致新的通货膨胀。总理别莱茨基和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支持这一种意见。

2月23—24日 团结工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格但斯克市举行。大会是在团结工会前主席瓦文萨当选总统后,工会缺主席情况下提前召开的。参加大会的代表500人,代表230万会员。瓦文萨在大会上说:团结工会现在和将来的很长时间内仍将是波兰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工会不能、也不会代替政党。波兰需要成立具有明确纲领的政治团

配的渠道,旁落到私人手中去了”(《应该怎么办?——反驳“改革派”的理论》,见《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第87辑)。在苏联已经产生了拥有数百万卢布的“苏维埃资产阶级”,他们同“政权机关中一部分易被收买的人”结成集团,形成联盟。这就是“贪污、腐败、贿赂、勒索欺骗顾客、黑市投机”等等的结果。

在同一杂志的一篇文章《改革和苏联经济》中,作者阿·塞尔盖耶夫(工会运动高级学校经济学教授)指出:“不到储蓄者总人数 $1/3$ 的人拥有储蓄总额的 $1/2$ (150多亿卢布)”,假如创立资本市场,这些人就有可能成为“股份资金的购买者”。他还指出:“既然能形成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也会出现,劳动力必然转为商品。这就意味着剥削和占有他人劳动。”

引进市场经济,已如现实所显示的,首先产生了隐匿物资、黑市投机、贿赂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腐败现象,又会带来通货膨胀、企业倒闭和失业。这不是作为商品经济规律所不能避免的吗?

衷心祝愿苏联人民能从这种混乱中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实践下去。虽很困难,但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消除官僚主义,使社会主义作为人民大众的事业复兴起来。

(原载[日]《社会主义》月刊,1990年10月增刊号)